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高丙中 主编

CHILSUNGU

祈 颂 姑

——赞比亚本巴女孩的一次成人仪式

〔英〕奥德丽·理查兹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祈颂姑

——赞比亚本巴女孩的一次成人仪式

〔英〕奥德丽·理查兹 著

张举文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祈颂姑:赞比亚本巴女孩的一次成人仪式/(英)奥德丽·理查兹著;张举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15402-4

I. ①祈… II. ①奥…②张… III. ①成年人—礼仪—研究—赞比亚 IV. ①K894.73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4652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祈颂姑

——赞比亚本巴女孩的一次成人仪式

[英] 奥德丽·理查兹 著

张举文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402-4

2017年12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插页 2

定价:45.00 元

Audrey I. Richards

CHISUNGU

A Girls' Initiation Ceremony among the Bemba of Northern Rhodesia

© 1982 Audrey I. Richards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根据罗德里奇 1982 年版译出



奥德丽·伊莎贝尔·理查兹

[转自《仪式的阐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Ritual*),
简·拉封丹(J. S. La Fontaine)主编, 1972]

总 序

学术并非都是绷着脸讲大道理,研究也不限于泡图书馆。有这样一种学术研究,研究者对一个地方、一群人感兴趣,怀着浪漫的想象跑到那里生活,在与人亲密接触的过程中获得他们生活的故事,最后又回到自己原先的日常生活,开始有条有理地叙述那里的所见所闻——很遗憾,人类学的这种研究路径在中国还是很冷清。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民族国家都要培育一个号称“社会科学”(广义的社会科学包括人文学科)的专业群体。这个群体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无论被期望扮演多少不同的角色,都有一个本分,就是把呈现“社会事实”作为职业的基础。社会科学的分工比较细密或者说比较发达的许多国家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发展出一种扎进社区里搜寻社会事实、然后用叙述体加以呈现的精致方法和文体,这就是“民族志”(ethnography)。

“民族志”的基本含义是指对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记述,希罗多德对埃及人家庭生活的描述,旅行者、探险家的游记,那些最早与“土著”打交道的商人和布道的传教士以及殖民时代“帝国官员”们关于土著人的报告,都被归入“民族志”这个广义的文体。这些大杂烩的内容可以被归入一个文体,主要基于两大因素:一是它们在风格上的异域情调(exotic)或新异感,二是它们表征着一个有着内在一致的精神(或民族精神)的群体(族群)。

具有专业素养的人类学家逐渐积累了记述异民族文化的技巧,把庞杂而散漫的民族志发展为以专门的方法论为依托的学术研究成果的载体,这就是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科学的民族志”。人类学把民族志发展到“科学”的水平,把这种文体与经过人类学专门训练的学人所从事的规范的田野作业捆绑在一起,成为其知识论和可靠资料的基础,因为一切都基于“我”在现场目睹(I witness),“我”对事实的叙述都基于对社会或文化的整体考虑。

民族志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所磨砺出来的学术利器,后来也被民族学界、社会学界、民俗学界广泛采用,并且与从业规模比较大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结合,发展出宗教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教育人类学……

人类学的民族志及其所依托的田野作业作为一种组合成为学术规范,后来为多个学科所沿用,民族志既是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的一种文体,也是一种方法,即一种所谓的定性研究或者“质的研究”。这些学科本来就擅长定性研究,它们引入民族志的定性研究,使它们能够以整体的(holistic)观念去看待对象,并把对象在经验材料的层次整体性地呈现在文章里。民族志是在人类学对于前工业社会(或曰非西方社会、原始社会、传统社会、简单社会)的调查研究中精致起来的,但是多学科的运用使民族志早就成为也能够有效地对西方社会、现代社会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文体。

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的奠基人,涂尔干强调对社会事实的把握是学术的基础。社会科学的使命首先是呈现社会事实,然后以此为据建立理解社会的角度,建立进入“社会”范畴的思想方式,并在这个过程之中不断磨砺有效呈现社会事实并对其加以解释的方法。

民族志依据社会整体观所支持的知识论来观察并呈现社会事实,对整个社会科学、对现代国家和现代世界具有独特的知识贡献。中国古训所讲的“实事求是”通常是文人学士以个人经历叙事明理。“事”所从出的范围是很狭窄的。现代国家需要知道尽可能广泛的社会事实,并且是超越个人随意性的事实。民族志是顺应现代社会的这种知识需要而获得发展机会的。

通过专门训练的学者群体呈现社会各方的“事”，使之作为公共知识，作为公共舆论的根据，这为各种行动者提供了共同感知、共同想象的社会知识。现代社会的人际互动是在极大地超越个人直观经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展开的，由专业群体在深入调查后提供广泛的社会事实就成为现代社会良性化运作的一个条件。现代世界不可能都由民族志提供社会事实，但是民族志提供的“事”具有怎样的数量、质量和代表性，对于一个社会具有怎样的“实事求是”的能力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社会需要叙事，需要叙事建立起码的对社会事实的共识。在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有事实就出议题，有议题就能够产生共同思想。看到思想的表达，才见到人之成为人；在共同思想中才见到社会。新闻在呈现事实，但是新闻事实在厚度和纵深上远远不够，现代世界还需要社会科学对事实的呈现，尤其是民族志以厚重的方式对事实的呈现，因为民族志擅长在事实里呈现并理解整个社会与文化。这是那些经济比较发达、公共事务管理比较高明的国家的社会科学界比较注重民族志知识生产的事实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中，民族志的缺失造成了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的许多缺陷。学术群体没有一个基本队伍担当起民族志事业，不能提供所关注的社会的基本事实，那么，在每个人脑子里的“社会事实”太不一样并且相互不可知、不可衔接的状态下，学术群体不易形成共同话题，不易形成相互关联而又保持差别和张力的观点，不易磨炼整体的思想智慧和分析技术。没有民族志，没有民族志的思想方法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的扩散，关于社会的学术就难以“说事儿”，难以把“事儿”说得有意思，难以把琐碎的现象勾连起来成为社会图像，难以在社会过程中理解人与文化。

因为民族志不发达，中国的社会科学在总体上不擅长以参与观察为依据的叙事表述。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在运作中所需要的对事实的叙述是由文学和艺术及其混合体的广场文艺来代劳的。收租院的故事，《创业史》、《艳阳天》，诉苦会、批斗会，都是提供社会叙事的形式。在这些历史时期，如果知识界能够同时也提供社会科学的民族志叙事，中国社会对自己面临的问题的判断和选择会很不一样。专家作为第三方叙事对于作

为大共同体的现代国家在内部维持明智的交往行为是不可缺少的。

民族志在呈现社会事实之外,还是一种发现或建构民族文化的文体。民族志学者以长期生活在一个社区的方式开展调查研究,他在社会中、在现实中、在百姓中、在常人生活中观察文化如何被表现出来。他通过对社会的把握而呈现一种文化,或者说他借助对于一种文化的认识而呈现一个社会。如果民族志写作持续地进行,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文化上的丰富性就有较大的机会被呈现出来,一度被僵化、刻板化、污名化的文化就有较大的机会尽早获得准确、全面、公正的表述,生在其中的人民就有较大的机会由此发现自己的多样性,并容易使自己在生活中主动拥有较多的选择,从而使整个社会拥有各种更多的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界无法回避民族志发育不良的问题。在中国有现代学科之前,西方已经占了现代学术的先机。中国社会科学界不重视民族志,西洋和东洋的学术界却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民族志,描绘了他们眼中的中国社会的图像。这些图像是具有专业素养的学人所绘制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基于社会事实。然而,我们一方面难以认同它们是关于我们社会的完整图像,另一方面我们又没有生产出足够弥补或者替换它们的社会图像。要超越这个局面中我们杂糅着不服与无奈的心理,就必须发展起自己够水准的民族志,书写出自己所见证的社会图像供大家选择或偏爱、参考或参照。

这个译丛偏重选择作为人类学基石的经典民族志以及与民族志问题密切相连的一些人类学著作,是要以此为借鉴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推动民族志研究,尽快让我们拥有足够多在学术上够水准、在观念上能表达中国学者的见识和主张的民族志。

我们对原著的选择主要基于民族志著作在写法上的原创性和学科史上的代表性,再就是考虑民族志文本的精致程度。概括地说,这个“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的入选者或是民族志水准的标志性文本,或是反思民族志并促进民族志发展的人类学代表作。民族志最初的范本是由马林诺夫斯基、米德等人在实地调查大洋上的岛民之后创建的。我们选了米德的代表作。马

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最重要的开创之作,好在它已经有了中文本。

我们今天向中国社会科学界推荐的民族志,当然不限于大洋上的岛民,不限于非洲部落,也不应该限于人类学。我们纳入了社会学家写美国工厂的民族志。我们原来也列入了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描写英国工人家庭的孩子在中学毕业后成为工人之现象的民族志著作《学会劳动》,后来因为没有获得版权而留下遗憾。我们利用这个覆盖面要传达的是,中国科学学的实地调查研究要走向全球社会,既要进入调查成本相对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也要深入西洋东洋的主要发达国家,再高的成本,对于我们终究能够得到的收益来说都是值得的。

这个译丛着眼于选择有益于磨砺我们找“事”、说“事”的本事的大作,因为我们认为这种本事的不足是中国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软肋。关于民族志,关于人类学,可译可读的书很多;好在有很多中文出版社,好在同行中还有多位热心人。组织此类图书的翻译,既不是从我们开始,也不会止于我们的努力。大家互相拾遗补缺吧。

高 丙 中

2006年2月4日立春

成人仪式研究的一部 典范民族志著作(代译序)

张举文

在一个学术领域被称为经典的著作至少应具有两个特色:创新;启后。创新意味着在理论和(或)方法上凝聚前人智慧而从中有突破,并成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典范;启后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在多方面继续启发后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祈颂姑:赞比亚本巴女孩的一次成人仪式》(以下简称《祈颂姑》)无疑是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研究仪式,特别是女孩成人仪式,以及产生文本和撰写民族(俗)志等方面的一部经典,有着突出的学术价值。

《祈颂姑》作为一部经典,从其最初在田野的观察、访谈和文本采集,到二十多年后的出版问世,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检验而被公认为经典,其历程就好像是一次仪式性过渡,尤如从胎儿长大成人。其“成人”的意义不仅是书中所承载的文本和学术思考,还在于在这个过程中所隐含的一些更为深刻的问题:学科与学派的“跑马占荒”与“画地为牢”问题;学术与学科的“谁说了算”的意识形态与范式霸权问题;性别与派别在对异文化与本文化的研究中“谁说得对”的问题;局内人与局外人或主位与客位的“该谁说”的问题;以及如何在动态的文化中截取和理解静态瞬间的“怎么说”的问题;等等。不仅如此,作者奥德丽·理查兹本人的经历,及其时代背景也是研读《祈颂姑》必不可少的作业,特别是她的女性角色与殖民时代中由她所代表的人类学的发展阶段等问题。所以,在这本书中所展示的内容与作者个人的、学科的和时代的精彩与缺憾,都同样能启迪今天的学者去鉴古识今,反思各自的田野工作和文本分析,以求能立足于小,而放眼于大。

概括而言,《祈颂姑》一书的重要贡献至少有三大方面:在理论上,它为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仪式研究,特别是女孩成人仪式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案例和跨学科的研究角度;在方法论上,它为基于田野记录的民族志写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典范;在做人与做学者上,《祈颂姑》及其成书的历程体现出一位社会工作者对殖民主义的反思,也展示了一位社会人类学家为学科,甚至更广义上的学术研究所做的开拓性贡献。以下将就这几方面做一些背景性简述,希望有助于读者在不同层次和角度汲取本书的精华。当然,有必要先从作者的经历与时代说起(有关理查兹生平与学术思想的更多著述参见本文参考书目)。

一、作为女学者与社会改革者的奥德丽·理查兹

生平简历

奥德丽·伊莎贝尔·理查兹(Audrey Isabel Richards 1899—1984)的一生至少有两个相关的方面值得今天的学者思考:作为一位(女性)人类学家;作为一位社会改革者。然而,她在这两方面的重要贡献,至今仍没有得到应得的正确认识,这一事实无疑展示了跨时代的社会和学术偏见。

理查兹 1899 年 7 月 8 日出生于伦敦。父亲是位出色的律师,获得过爵位,并曾在当时的殖民地印度加尔各答工作,之后成为法学教授。母亲来自“知识贵族”家庭,积极从事社会福利工作。这些背景深深影响了理查兹成年后对公众服务事业的热爱。理查兹在家中四个女孩中排行第二。她的童年时代是在印度度过的。回到英国后进入一所有名的寄宿学校(Downe House School)。大学就读于著名的女子学校,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Newnham College),主修是生物科学。1922 年大学毕业后,她到德国做了两年社会救济工作,之后回到英国在纽纳姆学院开始读营养学硕士学位。期间开始关注文化需要与生物需要的问题,以及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思想。1928 年,她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成为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1930 年,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获得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一个野蛮部落的饥饿与工作》(*Hunger and Work in a Savage Tribe*)(于 1932 年出版)。这项对于本巴社会的研究不仅奠定了后来她的《祈颂姑》研究的基础,还确

定了她成为营养人类学的开拓者的兴趣。当时,马林诺夫斯基以他的课堂魅力和崭新的功能主义的社会人类学思想吸引了一批有为的学生,包括后来在学界颇有影响的福蒂斯(M. Fortes),埃文思-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等,为英国以及世界人类学奠定了重要的根基。理查兹正是这一小批人类学家中的一位,也是当时少有的女博士之一。

1931年至1932年,理查兹只身来到英属殖民地北罗得西亚,亦即后来独立的国家赞比亚,开始了对本巴部落的调查,这也是继续和扩大她的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这一年里,她集中调查了“祈颂姑”仪式,但是,当时完成的记录手稿直到1956年才得以出版为《祈颂姑》一书。1933—1934年,以及1957年,理查兹又先后多次回到非洲,在本巴和附近地区为殖民政府工作。

在她1955年从英国退休之前的二十多年里,理查兹奔波于殖民政府的工作与教学工作之间。1931—1937年间曾担任过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师。1935年,理查兹担任国际非洲语言与文化国际中心下属的饮食委员会(The Diet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fric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主任。期间还曾多次往返于英国和南非与乌干达等地。1938—1940年在南非的特兰斯瓦(Transvaal)地区工作,参与建立殖民地社会科学研究会(Coloni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并曾在1938年任南非金山大学(Witswatersran)的高级讲师。1941年她回到英国,在政府的殖民地办公室工作。1944年她再次回到伦敦经济学院教课。因为理查兹在各方面的出色工作,1945年她获得里弗斯纪念奖章(Rivers Memorial Medal)。她1946—1951年担任伦敦经济学院专职讲师,1948年,参与建立并任职乌干达的麦克勒里学院(Makerere College)东非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in East African),1950—1955年担任该所所长,来往于英国与乌干达之间。1955年,她获得最优秀不列颠帝国勋章五个等级中的第三等司令勋章(CBE)。1956年,退休后的理查兹开始在她的母校纽纳姆学院教课,并建立了人类学研究所,组织成立了剑桥大学非洲研究中心(African Studies Center in Cambridge)。

1959—1961年,理查兹因为她卓越的人类学研究,而不是因为她作为一位女性而被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有史以来第一位女会长。从1960

年代开始,理查兹开始关注自己居住的社区,运用人类学方法展开对“本文化”的研究,这也可以说是人类学从研究“异文化”转向对自身研究的先例之一。从1962年起,她与利奇等人类学家开始创立对“邻里”社区生活的人类学研究和学生培养工作。其成果体现在一系列有关出版物,如1981年出版的《处于核心的血缘关系:1960年代艾塞克斯西北的埃尔姆顿村的人类学》。1964—1965年,她担任英国的非洲研究学会(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第二任会长。1967年,作为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被选为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BA)。1974年,被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AAS)外国荣誉院士。1984年6月29日,理查兹在英国去世。

作为一位学者

理查兹师从于现代人类学的开拓者之一马林诺夫斯基,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创建与发展,以及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她的贡献在于成就本身,而不在于她作为女性;但正是因为她作为女性,在对女性有着很大歧视的社会和学术界,她的学术贡献过去没有受到应有的认识,而现在才得到越来越多的严肃的学者的敬意。这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理查兹作为人类学家的成就与贡献是多方面的,且经住了时间的考验(La Fountain 1992:89),突出表现在: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方法方面;营养与农业经济,以及作为营养人类学的开拓者方面(有关话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应用人类学与社会改革方面;仪式与母系血缘关系方面;性别角色的研究等方面。理查兹是第一位在非洲做田野记录的女性人类学家,也是第一位完整地记录了一次女孩成人礼的学者。理查兹对培养学生的关注、对学生与学生的同等尊重,以及她的贡献本身为她赢得了同行的极大敬意,这表现为:一部在她生前出版的纪念文集(《仪式的阐释》,1972年);牛津的“跨文化女性研究中心”在理查兹去世前设立的包括她在内的三位女性人类学家讲座(其他两位是 Phyllis Kaberry 和 Barbara Ward);一部在她过世后出版的纪念文集(《多元文化中的女性个体与力量》,1992);以及现今牛津大学的年度“奥德丽·理查兹讲座”和英国的非洲研究会(ASAUK)始于1994年的两年一度的最佳非洲研究博士论文“理查兹奖”。当然,还有最新的《社

会和文化人类学理论》对理查兹的高度评价(Mills 2013:699-702)。

作为一位女性学者,理查兹是位开拓性的女人类学家(Mills 2013:702)。尽管理查兹从博士毕业到退休一直积极从事教学,但她始终未能在高校得到终身教职。她的成就丝毫不亚于她的男性同学与同事。这似乎明显反映了那个时代在学术界对女性的明显歧视,这不仅存在于英国,也同样存在于美国等地。美国取得类似成就的女性人类学家,如本尼迪克特(R. Benedict)和米德(M. Mead),都没能得到终身教职。正如格拉德斯通(Gladstone)所指出的,即使是利奇等作为马林诺夫斯基的同事与好友,以及理查兹的同学,在回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发展史时,也常常忽略掉理查兹等女性的成果与作用(1986:354),而马林诺夫斯基本人也常对他的女学生们挑剔和欺负(1992:28)。即使到1980年代,英国的人类学界仍有着明显的对女性的歧视(Caplan 1992:81)。这似乎已经解开了格拉德斯通始终感到困惑的“她为什么不是正教授”的谜(Gladstone 1992:26)。但是,这些对“女性”歧视的根本态度在人类学界是不分国界始终存在的,即使是在“后现代”反思的热潮中(Caplan 1992:68-73)。这一切导致了理查兹的多方面的贡献从未被整个学科所认知(Mills 2013:701)。

从英国人类学的发展史来看,“社会人类学”无疑要归功于马林诺夫斯基。但有意义的是,当时的女性为这个学科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正如利奇回忆说,“大约从1924年起,在牛津和剑桥的研究生们几乎都因某种原因受到‘社会人类学’的吸引,来到马林诺夫斯基的足下,其中最出色的有三位,维奇伍德(Wadgwood)、理查兹和贝特森(Bateson)”(1984:8)。的确,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英国社会人类学是个很小的跨学科领域。直到1939年,整个不列颠联盟也不足20位职业社会人类学家(Kuper 1973:90)这其中多数是女性(Lutkehaus 1986:776)。时至今日,我们看到这些学者,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男性包括,弗思、利奇、贝特森等。但能被今天的基础人类学教材所记述的那个时代的女性人类学家似乎只有理查兹。

除了性别之外,学术派别的歧视同样深深影响着学科和学术的发展。例如,理查兹因为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且有了突出成就,于是被冠以马

氏忠实信徒的名声,由此,她的诸多方面的贡献就被忽视了。同样,即使是马林诺夫斯基本人,当人类学的结构学派在 1930 年代开始占上风时,他的一些先前的功能派的学生也纷纷倒向结构派,最后迫使马氏离开英国。

然而,作为学者的理查兹能够逾越学派和学科间的鸿沟、个人间的偏见,在自己的著作中客观地引用各家各派的论述。这在《祈颂姑》中有明显的印记。如此客观、全面与谦虚的学术气度即使在今天也不多见。例如,学术史证明,涂尔干对批评自己的范热内普是排斥和打击的;列维-斯特劳斯也从没引用范热内普而默认自己为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特纳在理查兹之后到同一地区进行类似的田野并发表极其相似的象征分析观点,但直到 1964 年才提到理查兹。

总结理查兹的学术生涯,弗思(Firth)写道,“理查兹不仅是马林诺夫斯基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也是奠定英国社会人类学的一分子。她为民族志研究的理论创立了高端的研究榜样。她为同事和学生提供想法和基本功,成为一种驱动力量,是他们的良师益友。”(1985:341)格拉德斯通认为“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理查兹丰富了人类学,其贡献具有灯塔意义”(1986:338;1992:13)。

理查兹的著作(见本文后所附书目)清楚地展示了她所关注的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经过时间的考验,理查兹的《祈颂姑》被认为是具有经典价值的,是研究女孩成人礼中“最完整和最杰出的著作”(Brown 1963:837),是她的成就上的“皇冠”(La Fontaine 1985:203),体现了理查兹遵循马林诺夫斯基的“系统性资料搜集与仔细的实践研究”的原则(Mills 2013:700)。

对于中国的人类学者,理查兹似乎不为人所知。虽然近年有一部理查兹的译著出版,《东非酋长》(商务印书馆,1992),但那是理查兹所编辑的若干部概述性资料文集之一。体现理查兹对学术理论的深入探讨或方法应用的,无疑要属《祈颂姑》。

作为一位社会改革者

理查兹的贡献不仅是学术的;她更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改革家(Mills 2013:699)。她经历了殖民主义的高峰和殖民时代的终结,理查兹曾经服务于英国的殖民机构,但也为殖民地的独立做出过贡献。她对营养人类学、农

业经济、社会福利等问题的关注与贡献,至今仍然受到相关学科的尊重;她对非洲社会和英国社会中的性别、教育和社区关系的研究都具有开拓意义。

理查兹为殖民政府工作的经历印证了时代对学术的影响。但是,理查兹不是也不同于殖民地官员,她是文职人员且主要服务于科研机构。她对殖民制度给被殖民的社会的文化带来的影响有深刻的反思。例如,她在《祈颂姑》中提到“祈颂姑被传教士禁止了三十到五十年”(本书边码第139页),表示了对殖民文化给非洲当地文化传统带来的影响的反感。正如拉封丹指出,理查兹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帮助当地的政府和官员去解决当地的问题。拉封丹写到,毫无疑问,是理查兹最早指出,从英国政府的角度去试图将本巴现代化的努力是有害的;“理查兹不仅是出色的社会人类学家,也是最广义的非洲学家。除了关注非洲的社会与文化,她更关注的是非洲人民”(La Fontaine 1985:201)。

然而,理查兹多年在英国的殖民办公室下的研究机构工作,尽管也在殖民地独立初期坚持研究的独立性,但似乎也曾为一些殖民政策辩护过(Mills 2013:701),所以,有个别观点认为她是殖民主义的捍卫者。事实上,人类学,特别是在英国的人类学,之所以能有极大的发展正是因为有了非洲殖民地这样的“试验田”,以及“二战”后政府给殖民体系的大量资助,包括对“科研”的大量拨款(Mills 2013:163)。理查兹是处于殖民制度和殖民地之中,利用了殖民制度和机构,通过记录和研究被殖民文化,为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无疑,她是殖民体制下受益的人类学家之一。但是,理查兹与诸多人类学家不同的是,她也关注了殖民制度对被殖民地文化的影响,特别是负面影响。例如,理查兹特别关注因为对殖民地资源的开发而造成的大量男劳工去开采铜矿,从而对当地传统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本巴村中的男劳力在传统的仪式中消失。她也指出了欧洲人以殖民者身份出现在田野时如何影响了当地人对传统的阐释(参见本书边码第55、60、115、137、210等页)。这是最早的“反思”之一。更难得的是,理查兹试图以自己的研究和记录帮助当地人解决当地的问题,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如她所从事的有关营养、儿童和女性教育的福利工作,这些都是当时的人类学家对殖民地很少关心的问题。她支持东非国家在独立时要保持不同部落的文化传统,